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中国古代思想 学说史

侯外庐 著

中国古代思想，由其发展的递变而言，第一阶段为「学在官府」的唯官贵族之学，第二阶段为《诗》、《书》传授之学，据此而批判出了显学，第三阶段始普遍成为私人创著，百家并鸣之学。第一阶段，以存世文字说来，从殷末卜辞开始，至「郁郁乎文哉」的西周《诗》、《书》为代表思想。第二阶段，春秋儒学发展为「显学」的潮流，所谓「孔墨毕起」（《庄子》），俱道尧舜的「世之显学儒墨」。第三阶段，为「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各为其所欲焉以自方」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子学」。

岳麓书

021
27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

侯外庐 著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侯外庐著.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12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

ISBN 978-7-80761-354-1

I. ①中… II. ①侯…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B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5782 号

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

作 者: 侯外庐

责任编辑: 曾 倩 邓 萌

封面设计: 肖睿子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 0731—88885616 (邮购)

邮编: 410006

网址: www.yueluhistory.com

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640×960 1/16

印张: 18.5

印数: 1—6,000

ISBN 978-7-80761-354-1/G·805

定价: 25.00 元

承印: 长沙鸿发印务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 0731-88884129

整理说明

一、丛书着力于“学术”与“文化”两方面，所收著作或为学术上开新之作，或为文化上奠基之作。

二、丛书之收书范围，原则上起于民国建立，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然某些著作之成形，可追溯至民元之前若干年，因其有重要地位，亦酌情收入。

三、文、史、哲之分，原系西洋通则，本就不太适用于中国学术，故丛书不按学科分类，而是根据整理进度，顺次出版。

四、丛书所收诸书，原版均为繁体竖排，在其流布过程中，亦有版本差异、文字错讹等现象，为方便读者，此次做如下整理工作：

1. 繁体字改为通行之简体，竖排改为横排（原书中“左表”、“右表”、“左文”、“右文”均改为“上表”、“下表”、“上文”、“下文”），但为充分尊重原著，原书中专名（人名、地名、书名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凡底本脱、衍、讹、倒之处，除个别讹错明显且影响文意阅读者稍作改动外，皆一仍其旧。

2. 凡排印误刻者，如日曰、己巳巳、戊戌戌之类，均径改，不出校记。

3. 为方便当代读者阅读，标点符号按现代汉语使用规范作了处理。

4. 丛书中多本有作者原注，原书以夹注出之，此次整理皆排入正文，并以楷体小字以为区分。

5. 各书附“后记”一篇，说明著者爵里、版本流布、各界评论等情况，以期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南。

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吾人虽勉力为之，而乖漏难免，还祈方家教正。

自序

本书是著者过去讲授中国思想史古代编大纲底详明扩充，有些地方改正了过去的纲目，但大体上研究体系是没有改变的。当时应同学之要求，拟分古代、中古、近代三编，在短期间成书，然因了生活环境之变迁以及学说兴致之偏重，这项笔债匆匆八载没有偿还，现在古代编写成，虽未可云全偿，而心愿稍安。但本书体裁，注重研究，和讲义之编排陈列货色者，殊有区别。

本书和拙著《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为姊妹作，乃历史与思想史相互一贯的自成体系，材料的处理见于二书者，互为补充，避免重覆，读者研究中国思想史，当要以中国社会史为基础，故二书并读，实为必要。

过去研究中国思想史者有许多缺点，有因爱好某一学派而个人是非其间者；有以古人名词术语而附会于现代科学为能事者；有以思想形式之接近而比拟西欧学说，从而夸张中国文化者；有以历史发展的社会成分，轻易为古人描画脸谱者；有以研究重点不同，执其一偏而概论全般思想发展的脉络者；有以主观主张而托古以为重言者，凡此皆失科学研究的态度。我们要批判地接受中国文化古代的优良传统，却未能犯此一

道。本书自信没有此种积习。

著者认为上面的研究态度，有之固足以影响科学的研究，但无之亦不能必谓即可阐微决疑，主要尚在真理的钻研是否科学：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想的发展，关系何在？人类的新旧范畴与思想的具体变革，结合何存？人类思想自身的过程与一时代学说的个别形成，环炼何系？学派同化与学派批判相反相成，其间吸收排斥，脉络何分？学说理想与思想术语，表面恒常掩蔽着内容，其间主观客观，背向何定？方法论犹剪尺，世界观犹灯塔，现实的裁成与远景的仰慕恒常相为矛盾，其间何者从属而何者主导，何以为断？凡此，尤为研究学人所宜把握，紧密而严肃者犹恐失之误解。

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第一步，当以文献学为基础，作者的时代，著书的真伪，文字的考证，材料的头绪，皆专门学问，清代学者于此成就虽宏，而慎以取舍，颇为难题，若稍不慎，即张冠李戴。

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第二步，当以古人用语的实在所指为起点，各家所用术语除了其自身的特别规定外，更有中国古文字的限制，难以就表面文字即一望而知其概念所含性质，故谨加分析，颇为不易。若不仔细推断，即蔽于文字符篆。

本书就学力所及，自信谨严，一如金石家的谨严态度而守规范者，至于真理研究的实在性，未敢确知，是望大雅之教正。中国常有一句老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易传》），这是是非两可的论理，著者不望以“自成一家言”而读此著，而望根据真理的高级形态，严对此书，惠以指摘！著者时在虚心期待着畏友们的批评。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重庆郊外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自 序	1
第一章 中国古代思想底三阶段	1
第一节 西周官学时代及其官学	1
第二节 官学到私学底转变	8
第三节 子学思辩的时代及其前途	16
第二章 殷代的主要意识生产	21
第一节 殷代历法意识生产的起源	21
第二节 殷代“卜”的意识生产	25
第三章 周人“国有思想”及其前途	30
第一节 周人“国有思想”的原因	30

第二节 周人的“天人合一”思想	32
第四章 周人思想第一次的变迁	48
第一节 第一次思想变迁的历史原因	48
第二节 周代悲剧思想的先趋之路	56
第五章 孔墨显学主潮论上（方法论之异同）	67
第一节 春秋思想文物的具文化及其显学批判	67
第二节 孔子知识论的特点	74
第三节 墨子知识论的特点	82
第六章 孔墨显学主潮论下（学说体系之异同）	96
第一节 孔墨显学的优良传统	96
第二节 孔子学说的体系	99
第三节 墨子的学说体系	114
第七章 老庄学派反“显学”的智者学说	132
第一节 老庄学派的历史路线	132
第二节 老子学说的体系	136
第三节 庄子的概念游戏	146
第八章 儒家思孟学派及其放大的了儒学	160
第一节 子思孟轲的学派研究	160

第二节 中庸思想的形而上学	168
第三节 孟子的社会人类观	172
第四节 孟子的政治思想	177
第五节 孟子的天论与性善论	181
 第九章 后期墨家及其通约了的墨学	185
第一节 辩者墨学的学派性	185
第二节 辩者墨学对于墨子学说的修正	189
第三节 辩者墨学对于墨子道德学说之发展	194
第四节 后期墨学的科学论	196
第五节 后期墨学的认识过程论与论理学	201
 第十章 诡辩学者的论理学	211
第一节 诡辩学者的学派性	211
第二节 惠施及其论理学	213
第三节 公孙龙及其论理学	216
 第十一章 中国古代思想底综合者荀学	221
第一节 荀子的时代与荀学	221
第二节 荀子在古代学说中的批判与发展	227
第三节 荀子唯物论的要素及其无神论	229
第四节 荀子的认识论与论理学	232
第五节 荀子“性恶”论中的两条战线之斗争	234

第六节	荀子学说的局限及其批判	236
第七节	荀子关于儒家传统的朴素修正	238
第十二章	法家的悲剧历史与韩非子	242
第一节	法家的历史及其历史觉醒	242
第二节	韩非子历史的并思想的传统	249
第三节	韩非子的学说概论	257
第四节	韩非的理想与历史的现实	260
第十三章	附论屈原思想	263
后 记		285

第一章

中国古代思想底三阶段

第一节 西周官学时代及其官学

中国古代思想，由其发展的递变而言，第一阶段为“学在官府”的畴官贵族之学，第二阶段为《诗》、《书》传授之学，据此而批判出了显学，第三阶段始普遍成为私人创著，百家并鸣之学。

第一阶段，以存世文字说来，从殷末卜辞开始，至“郁郁乎文哉”的西周《诗》、《书》为代表思想。

第二阶段，春秋儒学发展为“显学”的渊流，所谓“孔墨毕起”（《庄子》），俱道尧舜的“世之显学——儒墨”。（《韩非子》）

第三阶段，为“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各为其所欲焉以自方”（《庄子·天下篇》）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荀子》）的子学。

大体上这便是西周、春秋、战国三个阶段的分野。若按照我们所论证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讲来，以上的区别，便不仅是一个形式上的类概念，而恰和历史的现实发展相为适应的。

中国古代学术的三个阶段，在成于战国末年的《庄子·天下篇》，颇

能看出一个脉络。

第一阶段——“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天’、‘德’概念见于周金，《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书详言）……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谓之君子。……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吏，尚多有之。”

第二阶段——“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第三阶段——“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百家之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天下篇》是古代的一篇最好的思想史序论，以上引文为《天下篇》的总论，我们仔细剥去理想，而研究其顺序，学术史亦可以说是由圣王君子而邹鲁缙绅先生，由邹鲁缙绅先生而诸子百家。

第一个阶段——古典社会氏族贵族的专政，从“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周书·酒诰》）， “武王嗣文王作邦”（大盂鼎），成立了中国的“城市——国家”以来，是以“氏所以别贵贱”做城市与农村的纽带。社会的分工，首先是基于过时的氏族传统之遗制，即一种人类是以血缘结合的公子公孙，另一种人类是以血缘结合的黎民、顽民，在古文献的术语讲求，即所谓君子与小人。在这一社会分工的前题之下，事业家和观念家是没有分裂的存在条件，因此，“政教合一”，观念的东西亦是专式的，所谓“学在官府”。

“礼者，法度之通名，大别则官制、刑法、仪式是也。《周官》三

百七十有余品，约其文辞，其凡目在畴人世官”（章炳麟《检论》）。章氏在原书注中复引古义，以证历书、卜筮、诗乐，诸种观念家，都是“家业世世相传为畴”，不仅“礼”这一观念家。

《周官》为伪作，但学在世官之说乃不可易。据郭沫若氏《周官质疑》（《金文丛考》）列举彝铭文中官职，考“三左三右”之职，为大祝、大卜、大史、大宰、大宗、大士，大约这是西周的贵族学人，而“畴人”恐为后起之名。

“圣人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傅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故无私门著述文字”（章学诚《校讎通义》）。

《汉书·艺文志》诸子出于王官之说，牵强附会之处颇多；胡适之曾以常识辨之，造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前者似伪中有信，后者则信中有伪。因为，西周官学确是史实，作者认为孔墨显学由官学转化之途径，迹线可循，诸子发展了孔墨之学，亦源流昭著，但谓诸子出于王官，则伪；春秋到战国的社会史，产生了诸子学术，另有研究的正确说明，胡先生是知道些近代历史学的 ABC，其批评古人固裕如其辞，但谓古代官学与子学没有递嬗蜕化之史事，亦伪。

在这里，古代官学之制，冯友兰氏颇看出一点消息，但其所谓之“贵族”，应规定以“古代的”三字，而道理亦至复杂，未必即此而已。他说：

“古代本为贵族政治，有政权者即有财产者，即有知识者，政治上经济上之统治阶级即知识阶级，所谓官师不分者即此而已。”（《中国哲学史》第一篇）

冯先生承认胡适先生批评他的哲学史“是正统派的”，但他亦不愿意满足于正统派，说：“吾之正统派的观点，乃‘合’而非‘正’也。”上面的论断便是既主要观点在正统派而又不是正统派的。

西周官府之学究竟是什么呢？这正是中国几千年来官司没有打得清白的“经学”。

古无《易》、《诗》、《书》、《礼》、《乐》、《春秋》，称为“六经”之名，章实斋谓因“传”而有“经”之名，犹因子而立父之号。《孟子》、《荀子》书中称道古籍，然未称六经。“五经”之说创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无《乐经》），故王充说：“夫五经亦汉家之所立也。”《庄子·天运篇》虽有“丘治《诗》、《书》、《礼》、《易》、《春秋》六经”之语，据钱穆先生云：“是谓六经先孔子有，虽《春秋》亦非孔子作也。以《易》与《诗》、《书》、《礼》、《乐》并称，亦出秦火后阴阳家言。”（《国学概论》）“六经”之名乃王莽时所立，“平帝时，莽奏立乐经，随立六经祭酒”。（《汉书·王莽传》）

研究中国古代史者，辄引《易》为之证，但据清代以后学者所考证，《易》晚成于战国后期。取其中传说性的断片材料而证古史，犹嫌危险，若据而论证思想史，必陷于张冠李戴，而搅乱历史。所以，我们首先要辨《易》。

据郭沫若氏考释，《易》之八卦，金文未见，“《易》之八卦所托甚古，然可异者，彝器中迄未之见。宋人书中有所谓‘卦象卣’者，凡二具，乃其一字之铭与卦象相似。其一作，又其一作。按此仅与卦象相似而已，决非卦象也。张抡内府古器以第二器之竖作者为渊卣……然亦作字。古器铭中凡作一二字之图形文字者殆即作器者之族徽或花押，其字不可尽识也。卦象宜于作花纹图案，然于彝器之花纹决未有见。基本二卦之乾坤二字亦为金文所绝无。金文无与天对立之地字，天地对立之观念，事当后起，则乾坤对立之观念亦当后起矣”（《金文丛考·金文所无考》）。郭氏所注意者，殊为研史的关键，他学无止境地公开指正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一篇错误观点，和有些发明论者是相反的。天地对立观念之后起，更值得注意，他虽然没有说出所以然，但问题的发现则是前无古人。

《易经》之作，在写《易传》的那位学者，也不能不露出马脚，仅问一番易之兴于什么时候呢？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系辞传》）

据《论语》中材料看来，孔子对于《诗》、《书》、《礼》、《乐》，一再论之，但没有一处断《易》的文句，例如：

“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学礼乎？”

再，《论语》中亦有以下的文句：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前一条，《鲁论》作“加我数年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钱穆氏亦断无孔子五十学《易》之说。

后二条，清人顾炎武疑之，崔述以来，钱玄同与顾颉刚二氏商确甚当，宁可说《易》之钞袭《论语》。

《孟子》书中，《易》未言一字，《荀子》书中始有引《易》论《易》之文，《庄子·天下篇》又云：

“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天下篇》的作者为《庄子》后序，成于后世，已成定论，且前言《诗》、《书》、《礼》、《乐》，后复加释《易》与《春秋》，文不对题。马叙伦氏谓“《易》以道阴阳”以下二句为注释之误刻，甚是。

郭沫若氏《驳〈说儒〉》中曾论及《易》之构成年代，断《易》之作者为肝臂子弓，时代相差不远。（其所著《易之构成年代》一文，尚未拜读）就思想系统而言，尤其是《易传》，一方面要和《大学》、《中庸》比较研究，一方面亦要和《荀子》相证研究。这样才可以论究古代中国思想的脉络。

西周文献，除《易》为战国作品外，即所谓《诗》、《书》、《礼》、《乐》了。“礼”为当时之不成文法，有否简册，未能断定，即有断简记载，亦不是一个系统著作，如《荀子》所言，“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劝学篇》）今存世之“三礼”，乃出于汉人之手，已成定论，所以《周礼》这一观念物，仅能从氏族贵族的典章中推论，而没有可靠资料。存世金文没有“礼”字，仅有与“礼”同义之“丰”字，《周书·洛诰》等篇有“礼”字，合称“宗礼”。

乐与诗，古者二而一，所谓“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歌者为诗，击者拊者吹者为器，合而言之谓之乐。”（《日知录》）这样看来，我们认为西周的文献，仅剩《诗》、《书》。然，问题亦不简单。自秦火焚《诗》、《书》以后，说《诗》说《书》者，亦门户别出，这里实未能介绍。大体讲来，《诗》、《书》材料应加辨别如下：

《诗》——《诗》的年代包括了西周、东周，这是研究《诗》的学者所最注意的，《周颂》最古，约成于周初之昭穆（所禋祀者，为文、武、成、康），《大雅》则由周初经幽厉以至宣王，《小雅》则多宣王中兴前后之作品，十二《国风》的作成年代显在东迁前后。《鲁颂》与《商颂》并皆春秋作品。顾炎武说：

“二南也，邠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诗也。至于幽王而止（原注：惟“何彼秣矣”，为平王以后之诗），其余十二国风则东周之诗也。王者